

古代冠礼的一种变异 ——庆号习俗

陈华文 陈顺宣

《青浦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古人冠而后字，斯礼久废。今泖滨农家，弱冠后为酒食，召乡党食之，谓之庆号，尚有古意。”而在清末《蒸里志略》及《章练小志》中也有相同的记载。

这种庆号习俗，如今在青浦县泖河一带是否仍然流行？下面是我们采集整理的记录

和对它所作的初步探讨。

解放前，青浦县泖河一带经济文化一直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。这里的青壮年，由于无地耕种，生活清苦，长年累月外出到朱家

出土的兽首鬲、斝、口鬲相似。这件究竟是何地生产，可作进一步研究。推测可能是楚国扩张战争所获胜利品，亦可能是楚国与南淮夷诸国交流而来。

匜形勺共出土2件，分别见于庐江县岳庙乡和六安县毛坦厂镇，形制相同，纹饰亦相近，其特点是勺为匜形，柄为长梯形，尤其是柄与勺衔接部位铸造科学，十分实用。

南淮夷国家为数众多，上述诸国只是其

中一部分。从目前所见其青铜器上，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具有的高超的文明程度，淮夷族是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创造者，过去，对淮夷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，本文意在抛砖引玉，淮夷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还俟大家。

拓片：孙春榕 摄影：马起来

〔马道渊，男，现年54岁，安徽省肥东县人。在安徽省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工作30多年，现为安徽省博物馆馆员。〕

(1)、(10)、(15)《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第10期498页。

(2)《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》图五十四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7年5月。

(3)、(13)《安徽怀宁出土春秋青铜器》，《文物》1983年第11期68页。

(4)、(9) 薛瑞璋：《淮夷新考》，《文物研究》第5辑，黄山书社，1989。

(5) 诸器分别见：马承源：《关于羶生盥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》，《考古》1979年第1期60页，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107页、108页、109页、120页、143

页、66页；《历代钟彝彝器款识》卷九101页；吴大澂、罗英杰：《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鬲斝》，《文物》1976年第5期94页。

(6)、(8) 见注(5)中马承源文。

(7) 见注(5)107页。

(11)《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》图13-16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7年5月。

(12) 同上图54、17、18。

(14) 马道渊：《安徽六安县出土春秋青铜器》(待刊稿)。

(16)《湖北省汉川县发现一批春秋青铜器》，《文物》1974年第6期。

角、练塘及县城的大户富家打长工、做短工，以维持生计。有家室者，孩子出生后父亲大多不在家中，加上原有遗存的风俗，出生的孩子都不正式命名，只随便以“阿猫”、“阿狗”之类乳名称之。待长到17—20岁左右，有了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的能力，男子就要举行庆号仪式。这种习俗至今尚存。

庆号，当地人又叫取大名，仪式相当隆重。时在每年稻禾未熟、田中活计较少的农历八月。村中青年分批自行约定，每批人数十几到二十几不等。在一批庆号者中，公推一位年纪较大、富有见识、家境较富裕的青年作为主持人。庆号分字辈，如“德”字辈，“庆”字辈，“雷”字辈，类似宗祠中的伯仲叔季。每当八月来临，有值庆号而未庆号的青年，不但家人劝其庆号，亲戚朋友也来游说。青年所取名中的“土”、“火”、“根”，由家中自行商定，含有五德相生（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）之义。他们相信命运，孩子一出生，便请算命先行推算八字，若缺火，则以“火”名之，缺土则以“土”名之，谓之补阙。

十年浩劫前的庆号仪式是这样举行的：庆号青年约定后，首推一主持人，大家分股出钱，合资由主持人出而去请戏班子来演戏，并延请厨师置办酒席，宴请亲朋好友。主持人出资最丰，一般庆号青年是20元左右，而主持人则出40、50元，甚或更多。届时集会演戏，借演戏时观者云集之际，主持人登台宣布全部庆号兄弟的大名。戏演毕，亲朋好友和来宾欢聚一堂，开怀畅饮，大家说些恭维、吉庆、勉励、祝贺之词。然后，在主持人带领下，庆号兄弟一路敲锣鸣钲，燃放炮仗，结队往村子的东南西北及各热闹场所张贴事先书写好的号单，贴完之后，仪式即宣告结束。

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庆号变称“改名”，而所改的大名与庆号一样都具有赋予新生命的意义。准备易名的青年，仍然相约十几、二十几人一批，事先与家人商定好所易名字之后，用奖状纸把改定的大名和原先的乳名（小名）一起写上。到时主持人便邀请前来参加改名仪式的各青年及亲戚邻友举行茶话

会，略备些茶点糖果。简易的茶话会一完，主持人与其他改名青年一道，敲锣打鼓，前往村中各处张贴名单。名单贴完，便由改名青年合资租请电影队放映一场电影，以表庆贺。到时，乡邻父老，男女老幼均前往观看。并在广播中宣布所易之名，重复几遍，规定从此以后，大家不得以乳名相称。

举行过庆号或改名仪式，青年人便列为成人，从此可以参加各种成人的活动，可以婚娶，生儿育女。不庆号的要被人歧视，被人认为“勿灵光”，被讥为“鼻涕虫”（仍是小孩子）。解放前，未曾庆号的青年是不得结婚的。不过妇女例外，女人是没有资格享受庆号的。

为什么要有庆号？浏河一带习惯认为庆号源于三国时刻，关、张的桃园三结义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在桃园结为生死兄弟，他们患难与共，有福同当，有福同享，在混乱动荡的社会中搏得立足之地。浏河一带村民崇尚刘关张的结义有为，把同字辈人视为同胞手足，生产上互相帮助，生活上互相照顾，碰上患难，大家协力度过，完全是侠义兄弟。没有庆号的青年，由于没有众多的“兄弟”，怕被人欺侮，晚上也有敢出门；受外人凌辱，也极少有人出力相助。解放前，在浏河一带可以见到相当多的庙宇都供奉着刘、关、张的金身大像，无形之中，这三位历史人物成了他们生活的庇护神。

二

查《三国志·蜀书·关羽传》载：“羽与张飞为之（指刘备）御侮。……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，恩若兄。”《张飞传》则云：张飞“少与关羽俱事先主。羽年长数岁，飞兄事事。”《先主传》则无羽、飞亲若兄弟之记载。惟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最为渲染，然也未有庆号易名之笔，结义略有，庆号当无。由此可证，庆号源于桃园三结义之说，实属后人牵强附会，不足为凭。那么，庆号是怎样发展来的呢？

庆号当是古代冠礼的变衍。

首先，冠礼和庆号同属成人之礼。《礼

记·冠义》曰：“已冠而字之，成人之道也。”所以，“见于母母拜之，见于兄弟拜之，成人而与为礼也。”不过这种冠礼是有一定的年龄限制的，“天子诸侯，十九而冠。”（《荀子·大略篇》）一般则以20岁为“弱冠”之年。加冠以后，即为成人，可以成婚，可以出仕了。庆号也具体规定年令，一般超过21岁或已婚就不能再举行这种仪式。第二，冠礼不但加冠以示成人，而且命字以别过去，这和庆号含义相同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曰：“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上》也曰：“男子二十，冠而字。”郑久注：“成人矣，敬其名。”在《礼记·檀弓上》“幼名、冠字”栏下，孔颖达疏说得更为清楚：“……幼名冠字者，名以名，质生若无名，不可分别，故始生三月而加名，故云幼名也。冠字者，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，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，故冠而加字。”“字”的作用具有新生命的意义，加字之后，则不可直呼其名，而当以字称之，表示尊敬，也表示新“质”的诞生，新生活的开始。庆号所取新名所具有的意义与冠字极为相似。庆号之后便不能再呼其乳名，而称其新名，否则当罚。可见，庆号与冠礼是有其内在联系的。

第三，从形式上看，冠礼和庆号都是庄重而严肃的。“古者重冠”，认为冠者，礼之始也。”（《礼记·冠义》）所以“行冠事，必于祖庙以裸享之礼将之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冠颂解》）无金石之乐，无祭祀之具，则不得行冠礼。行冠之时还须“筮日筮宾”卜吉凶休咎，还要祭祀祖先，宴请来宾宗人，并举行热闹的庆贺活动，而冠字后的“舞大夏”（《礼记·内则》），可能是庆贺的一种。只有这样，才“可以为人”、“可以治人”。庆号也类乎冠礼，举行的仪式也是相当隆重和肃穆的。未庆号时亲戚朋友、父母兄弟咸相劝谕，勉其加名。对于名字的取定，也不得个人擅权，而由全家商讨确定，或请先生来取，并且特别注重五行补阙，事先请算命先生推算未来，以求相救之法。庆号中虽已没有祀祖的活动，而庆祝、娱乐活动却有所留存。文化大革命前庆号时宴请宾朋，并聚资演戏。现在流行放电影、蓝球赛或茶话会

等。娱乐的形式虽不相同，但表达的意思却是一样的。

从以上几点我们不难看出，庆号与冠礼有一定的联系，名称虽异，却属同一风俗，两者之间，庆号是冠礼的传承和发展。当然，庆号中已注入了兄弟结义这一社会性的内容，这是冠礼所没有的。

三

冠礼盛于周秦汉时期，南北朝以后便逐渐衰落，而归于泯灭。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说》一文中曾记述孙昌胤复行冠礼被朝臣耻笑一事，说明在唐代冠礼已完全被人们摒弃，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。后来，各地府志，虽仍有冠礼的记载，如《杭州府志》：“冠礼，男子年十六，筮吉日，选宾僕，告诸家庙，三加训戒。女子于归日，母为之加髻，重婚媾也。”但也有记载：“男子既长，择日而冠，拜天地祖家父母，三加请戒之礼，不行久矣。”（《严州府志》）现在，最多在举行婚礼时，女子的“开脸”等可视为笄礼的遗存，而男子的正式冠礼已不复存在。

在冠礼湮没已久的情况下，泖河一带何以能以庆号而保存古之冠礼的某种形式呢？这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。

一、泖河一带在春秋时属吴越地区，周朝及春秋战国时皆为冠礼盛极之时，对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春秋末，越王灭吴，泖河便为越之辖区，到了战国，它或属江东或属会稽郡，交替管辖，社会经济极不稳定，再加上地处僻海，交通不便，问津者甚少。秦汉以后，泖河地在一隅，居民环河湖而住，生产力低下，经济极其萧条，仍然处于闭塞状态。直到解放前，沿河一带的村庄都居住着一些穷苦的农民，他们没有土地，没有文化，生活无保障，长年靠打长工、做短工糊口，时而也捕鱼副之。这种历史和地理因素造成的经济文化落后，使古朴的风俗——庆号，得以完好地保留了下来。

事实上，经济不发达导致文化的停滞落后，而文化的落后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。为

了与那个贫穷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抗争，就以庆号的形式把年轻人团结起来，互帮互助共同为自已的家庭和生活负责，免受或少受他人的凌辱。这种类似社会组织的庆号兄弟，是过去贫苦、不合理社会的产物，并伴随那个“社会”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。

二、由于经济落后，文化不发达，人们普遍地相信“万物有灵”，相信命运的主宰。他们特别迷信算命，孩子一出世便要占卜问卦，推算未来的吉凶，并在庆号时取新名，意味着从此与“旧我”一刀两断，走上新的生活。假如未曾庆号，那么此人一生将默默无闻，不能出人头地，并终将朽死于“旧质”。新生是人们的一种憧憬，是渴望新生活的美好愿望。鉴于这种习俗事关人生未来，又没有外来的新文化（更符合他们意愿的新文化）来冲击和替代他们原有的庆号风俗，所以就一直被延续了下来。

三、庆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被保存下来，还有一个习惯作用的原因。习惯的心理是随大流的从众心理，当然这种从众心理也是有功利取向的，即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而经济、文化越是落后，人们的生活方式、习俗就越趋向内倾、保守，便更喜欢墨守成规、摹仿旧有。基于这两个因素，一种习俗

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在贫穷、落后的地方存在下来，便不易消失掉。所以，历史虽久，社会形态也几经迭替，庆号总不能在人们的习惯中抹去。

四、结成庆号兄弟还可以在生产和生活上互相帮助，如家中生老病死，社会上的一些纠纷，佣工时发生的矛盾等等，都有协作的现实意义。庆号仪式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，使仪式带有改良和变异的色彩，这就为庆号这一习俗赋予了新的生命力，在变革中被保存了下来。

总之，庆号得以在泖河一带相沿流传下来，决非偶然，它是地理、历史、经济和习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
〔作者简介〕：陈顺宣 1938年2月出生，浙江武义县人。1959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，现任浙江师大学报编辑部编辑、副编审。曾发表过有关现代文学、语文教学、民俗学、编辑学等的研究论文30多篇，还出版过编著多本。

陈华文 1959年7月生，浙江武义县人，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，现在浙江师大中文系任教，曾发表民俗学、民间文学论文多篇。

